

美国在中东冲突中的宗教功能干预： 从二战结束到“史诗怒火”行动^{*}

章 远

摘 要：回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干预中东事务的叙事、动源、方式手段、公众回应和介入后果，不难发现宗教要素参与塑造行动全过程的特质。中东冲突和战争的交战方在变化，国际秩序和地区政治格局在变动，然而美国运用宗教干预中东的核心逻辑和关键过程没有根本变化。宗教仍然通过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建构主义三重路径作用于美国在中东冲突中的干预行动。美化战争的宗教外衣、煽动扩张的宗教野心无助于中东地区的和平和发展，不可能为当地人民营造真正的乐土。

关键词：国际秩序 中东冲突 宗教功能 外部干预

作 者：章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2026 年 2 月 28 日，美以伊冲突爆发，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面临新一轮的严重挑战。美国使用《圣经》中神圣审判的末日意象表述——“史诗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命名此次军事行动，而与美国密切联合行动的以色列则用《旧约》中代表犹太民族力量和权威的狮子象征命名军事行动为“咆哮的狮子”（Operation Roaring Lion）；冲突的另一端，伊朗用“真实承诺 - 4”（عمليات وعده صادق ٤ / Operation True Promise IV）命名军事行动，宣告什叶派对真主信实的守诺、对侵略的抵抗。三方军事行动均选取宗教符号明确的称呼，昭示这场延宕的冲突中不同势力在运用宗教叙事和宗教语言上的鲜明共振。与此番美国官方不惜在核心军事行动中大张旗鼓地打出宗教旗帜不同，二战后更长时间，美国基本不公开使用明确宗教元素的军事干预代号，而更倾向使用含地理气候特质、输出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用词。从过去军事行动刻意回避宗教用语到当前政客频繁引用宗教文本和宗教历史典故，变迁背后凸显的是美国逐渐不再掩饰对宗教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功能利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干预中东事务的叙事、动员、方式手段、公众回应和介入后果呈现突出的宗教功能塑造特质。宗教不仅仅影响美国国民的身份认同和美国社会公共舆论，还助长了美国公开高调地以宗教为名动员对外干预，并且显著影响后续的政治气候。中东冲突和战争的交战方在变化，国际秩序和地区政治格局在变动，但是美国对中东冲突中的宗教功能干预的核心逻辑和关键过程没有根本变化。事实上，自 20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解体、殖民国家通过《赛克斯 - 皮科协定》的政治安排埋下中东动荡遗患开始，迈入现代的中东地区就一直面临各种政治主体

^{*} 本文系 202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东和平的治理困境变化和中国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4BGJ078）的阶段成果。

之间反复陷入冲突循环的安全困境，其中外部干预问题始终在恶化地区安全局势上负有责任。而地缘意义上，美国实质干预中东军事冲突的肇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中东民族国家建立高潮。1948 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后，美国率先承认新生的以色列国，自此在阿以冲突和后来的巴以冲突中，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深入介入。1949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就曾秘密参与叙利亚政变。^① 1953 年，又是中情局，主导策动政变，^② 强行推翻伊朗民选的合宪摩萨台政府，促成巴列维国王复辟。冷战期间，因为历次中东战争中美国都站在反对阿拉伯统一和社会改革的势力一面，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基本没什么好感。^③ 美国在巴以和谈中严重偏袒以色列，纵容冲突的一方，加深了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负面印象。^④ 90 年代以来，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直到恶化全球经济形势的美以伊战争，美国介入程度日盛，是中东冲突和动荡的最大干预外部力量。

既有研究基本认可二战以来，石油是美国在中东的首要考量。尽管期间因为美国得益于页岩油革命和受到民主党强调输出自由主义的执政风格波及，美国在对中东政策表述中，石油所占的地位被技术表述地降低重要性。但是，事实上美国重视石油能源的战略本质从未偏移。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即强势干预委内瑞拉、伊朗内政的高调言行，坐实了美国领导层对石油的极端重视。为达到多维多向多元地保障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这一战略目的，宗教是美国官方可操作性极强，且利用率相当高的功能性政治工具。在今天国际秩序处于加快调整的时代背景下，客观中立地对美国介入中东事务过程中的宗教功能干预进行研究，也可以被视为宗教与政治理论研究的“美索不达米亚转向”。

一、美国对中东冲突干预的宗教式叙事

美国发动政治游说、战争动员、军事行动、经济制裁、代理人战争等等以中东为对象的冲突性干预行为，几乎都会涵括宗教因素，也往往因为对中东冲突的干预而产生宗教性后果。宗教因素系统地交织在美国行政决策、立法司法、对外交往、媒体舆论、民众支持等公共政治生活中。因宗教冲突和对外战争中的宗教干预有大量要素重叠，因此可以移植宗教冲突研究的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路径^⑤到美国对中东冲突或战争干预行动研究中。

（一）“神圣战争”

美国对中东的军事干预多出现将干预行为宗教意识形态化为神圣战争的现象，将战争包装为基于基督教国家的神圣使命，将军事行动赋予宗教预言和道德正当性，以“神圣化”的理由，战争动员军队和民意，特别是调动起宗教机构与世俗部门紧密合作，让宗教式借口解释对外干预、发动对中东的战争，对国内受众而言，不仅在政治上正当，道德上似乎也是正义的。^⑥ 尽管外部世界未必买账。

① Michael Jansen, "US Intervention in Middle East Has a Long, Difficult History," *The Irish Times*, April 20, 2017.

② Rashid Khalidi, *Resurrecting Empire: Western Footprints and America's Perilous Path in the Middle East*, Boston: Beacon Press, p. 151.

③ Zachary Lockman, *Contending Visions of the Middle East: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Orien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46 – 148.

④ Charlotte Morris, "To what extent has U. S. foreign policy contributed to an increase in religious inspired terrorism since 1945?" *Journal of Global Faultlines*, Vol. 6, No. 2, 2019, pp. 199 – 200.

⑤ [意] F. 佩蒂多、[英] P. 哈兹波罗编 《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张新樟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1 – 152 页。

⑥ Gregory A. Daddis, "Faith in War: The American Roots of Global Conflict", *Parameter: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Quarterly*, Vol. 46, Issue 4, 2016 – 2017, p. 44.

（二）“末日之战”

谈及美国国内宗教理念对激进的对外军事干预行动的驱动，福音派基督徒是美国中东政策最坚定的支持群体。即便当美国国内战争支持率整体下滑时，福音派群体仍保持鹰派立场。^① 美国福音派基于“前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的末世论信仰，认为中东冲突是《圣经》预言中“末日之战”（Armageddon）的预演。按照福音派的理解，以色列的存在与中东地区的动荡是基督再临的必要前提，因此强力支持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政策、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等中东国家发动激进的军事行动，通过干预让这些国家可以成为“传播耶稣福音的中心”^②。从宗教话语的历史渊源来看，推动亲以色列和反伊斯兰的政策与新教福音派传教传统长期将中东与《圣经》和末世论联系在一起，与美国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信仰，都有很大关系。

（三）“善恶之战”

美国战争语言有明显的高度简单化趋势，惯于挪用“经典”的“金句”贬低对手，称颂暴力。特朗普并不追求更高的个人虔诚度表现，同时却又引导受众接受其不凡的经历等同于基督教弥赛亚的附会神格化表述。^③ 现任美国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在他所著的《美国十字军东征》^④一书中把伊斯兰教视为美国敌人。在对伊朗战争中，赫格塞思持续运用宗教叙事与公众沟通，神化战争的道德高地。小布什总统在打击“基地”组织的反恐战争中也曾使用“十字军”^⑤一词。布什政府曾以神圣意识形态的宗教语言搭建主张宗教与世俗机构应紧密协作的伊拉克战争政策，从而吸引认同该理念的宗教群体支持美国对中东的干预行动。从早期赴中东的美国传教士将干预包装为传播文明与福音，到二战后美国政府将持续支持和偏袒以色列描述为履行圣经承诺，将打击敌对美国的组织和势力描述为“神圣战争”，与对其他地区的政策相比，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表述长期混合含宗教词汇、宗教典故、宗教历史和宗教意象的宗教叙事。

二、美国对中东冲突干预的宗教动源

从宗教影响冲突的原生主义的研究视角出发，宗教本身为干预的核心动源，是驱动美国对中东发动干预的深层内在，甚至不需要依赖其他世俗目标而长期、独立发挥作用。解释宗教冲突的原生主义观点认为，^⑥ 宗教是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础，宗教文明内嵌在民族国家内核中，宗教因素是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驱动因素。原生主义的解释逻辑是神赐身份是起点，神与被选中的民族之间的应许土地契约是超越历史和时间的永恒契约，是神应许的神圣秩序，有天然正当性。原生主义以此解释同样自认是属灵的选民的福音派基督徒和以色列人为什么可以因对远端命运的共

① Paul Froese, F. Carson Mencken, “A U. S. Holy War? The Effects of Religion on Iraq War Policy Attitud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0, No. 1, 2009, pp. 104 – 106.

② Oindrila Roy, “Religious Roots of War Attitu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ights from Iraq, Afghanistan, and the Persian Gul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pril 26, 2016, p. 3.

③ 时任美国白宫信仰办公室（White House Faith Office）高级顾问，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属灵顾问，宝拉·怀特（Paula White – Cain）在2026年4月1日白宫复活节午宴上，当特朗普的面用耶稣经历类比特朗普，获得满厅的掌声。同时，美国一些基督教和保守媒体等也刊登评论文章批评宝拉的言论是亵渎行为。参见 Eric Black, “Editorial: Is Trump Like Jesus? Nope.”, *Baptist Standard*, Apr. 8, 2026, <https://baptiststandard.com/opinion/editorials/editorial-is-trump-like-jesus-nope/>; Russell Moore, “Trump’s Al Jesus Might be the Messiah We’ve Been Looking for”, *Christianity Today*, Apr. 15, 2026,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2026/04/trump-ai-jesus-messiah-weve-been-looking-for/#main>.

④ Pete Hegseth, *American Crusade: Our Fight to Stay Free*, Center Street, 2020.

⑤ James Naus, “Trump Religion Iran War Crusades Middle East”, *USA Today*, Apr. 24, 2026,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26/04/24/trump-religion-iran-war-crusades-middle-east/89735780007/>.

⑥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99–202页。

同期待，而形成政策同频的宗教同盟。

（一）“锡安主义”政治游说

强大的宗教游说集团将支持以色列与美国国内政治、神学信仰深度捆绑，直接影响中东政策。美国的政教关系研究中，宗教游说团体是展示宗教如何成为影响外交政策的跨国政治力量的极佳样本，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上，甚至左右国家政治决策。^① 大部分福音派坚信支持以色列是推动圣经预言实现的必经步骤。^② 他们认为支持犹太人回归故土对福音派笃信的基督再临教义至关重要。约 2500 万美国福音派人士自称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在国会山的游说者人数甚至以 50:1 的比例远超阿拉伯裔团体的倡导者。^③ 美国最大的亲以色列组织“基督徒联合支持以色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等组织推动宗教基金投入到军售企业、拍摄为犹太人说好话的影视作品、让指责阿拉伯世界为阿以冲突责任方的内容进教材^④等等，构成支持亲以色列的基督教锡安主义实践链条。

（二）政治策略同频的宗教盟友动员

为能够对中东持续干预，美国利用宗教认同动员盟友，强化以色列的“犹太国家”身份；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耶路撒冷使馆法》促成了美国驻以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用“亚伯拉罕协议”，推动以色列与 4 个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正常化，打造以宗教和解和文明亲缘为纽带的中东版“北约”；支持以色列以“保护犹太人定居者”“反伊斯兰恐怖主义”为由强硬推行“大以色列”领土扩张；2020 年通过《泰勒·福斯法案》切断了对被证实能有效减少恐怖袭击的巴勒斯坦援助项目。批评者称这些法律和资助根本不是为了促进和平，而实际上是“侍奉撒旦”^⑤的神学“赎金”。还有非常重要的，美国延续冷战思维^⑥构建起反伊朗的地区联盟，不断削弱和打压伊朗盟友，^⑦并且美国希望这个跨宗教文明的联盟能在对伊朗战争中发挥作用。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美国利用宗教“团结”犹太教、基督教国家（西方）和所谓“温和的”伊斯兰国家以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眼中的“邪恶势力”^⑧伊朗。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暗含的身份焦虑来看，美国政客常将对外干预塑造成“白人基督教美国”与“非白人、非基督教世界”的文明间对抗，甚至给同一文明圈层内部划分等级、区分好坏，细化对立叙事。这是美国国内身份政治和阶级观念在中东政策上的投射。美国存在将伊斯兰教的宗教印象建构为“落后”“暴力”“排他”的，相对应地，建构本宗教群体的形象为“现代化”“良知”“包容”的信仰体系。对伊斯兰教的固有认知偏见认为穆斯林社会因信仰本质无法自主实现现代化、无法公正对待宗教少数群体。这种似乎原生主义实为建构主义的宗教认知逻辑，为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干预提供了长线的合法性叙事。从 19 世纪传教士活动将传播基督教、改造伊斯兰社会作为目标，到 21 世纪对这一地区发动的军事干预行动将伊斯兰极端主义归为文明冲突，宗教都被利用来为美国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

① 徐以骅《宗教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以美国宗教团体的“苏丹运动”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5 期。

② Nadeem F. Paracha, “Trump and Netanyahu’s Crusade”, DAWN, May 8, 2026, <https://www.dawn.com/news/1981507/trump-and-netanyahus-crusade>.

③ “The Armageddon Lobby: How Biblical fantasies hijack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JTODAY.NET, Jul. 21, 2026, <https://njtoday.news/2025/07/21/the-armageddon-lobby-how-biblical-fantasies-hijacked-american-foreign-policy/?noamp=mobile#respond>.

④ “Textbooks in Texas Blame Arabs for Conflict with Israel”, *The Jewish Ledger*, Sep. 26, 2018, <https://www.jewishledger.com/2018/09/textbooks-texas-blame-arabs-conflict-israel/>.

⑤ Ibid.

⑥ 刘中民《中东地区格局的冷战化趋势及其影响》，载《当代世界》2018 年第 2 期。

⑦ Jonathan Fox, Patrick James and Yitan Li, “Religious Affi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in Ethnic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Beyond”,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1, 2009, p. 176.

⑧ 马海云《终结文明代理 重建主权国家》，《联合早报》2026 年 4 月 21 日。

三、宗教功能介入的干预方式和手段

不仅仅是美国精英层利用宗教叙事、工具化宗教动员和解释功能，促成对中东干预政策的策略，这一宗教功能干预方式能奏效还基于美国大众的思想和态度。两个向度交互之间形成的互动框架属于建构主义径路的解释范畴，遵从通过话语建构、议程联动、身份塑造互动所形成的干预逻辑。

（一）以新构话语遮蔽历史沉疴

美国将中东冲突历史叙事遮蔽，把军事干预建构为“基督教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对立，将宗教身份塑造为核心冲突标识的手法。“文明冲突论”为美国以“文明守护者”身份介入中东冲突提供了话语基础，操作中甚至有利于强化公众对美国在中东军事干预行动的国内接受度。^①用“文明冲突论”来解释中东的冲突和赋予美国对中东干预以合理性，规避了西方造成当前中东安全困境的历史真相，把复杂的历史责任划分过分简化为文明与野蛮。在国际舆论场和国际关系场域，美国把历史因果复杂的巴以冲突简化为民主以色列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对决，偏袒以色列，事实否定“两国方案”的国际共识。

（二）将宗教绑定国家安全议程

美国将宗教与国家安全议程绑定，^②尤其在9·11事件之后把“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宗教挂钩，并将之建构为核心国家安全威胁，把中东干预行动塑造为“反恐战争”^③，将复杂的地区矛盾简化，这种建构让军事干预脱离了具体的地缘政治成本核算，更容易获得跨党派的舆论支持。建构是双向的，干预行动同时也塑造了双方的宗教身份，特别是宗教身份的互相警惕乃至对立。一方面，传教活动、媒体叙事不断强化“伊斯兰威胁”“什叶派威胁”^④、助推美西方“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另一方面，原本就存在仇美和反美土壤^⑤的中东也将美国的军事干预建构为当代基督教“十字军”^⑥，这种中东暴力反复和美国反复干预，循环往复成了自我实现的宗教对抗预言。被动员起来的参战人员并不真正了解对手。美国军方，特别是军人战地培训中缺乏关于中东宗教情况有深度的系统教育。

（三）用神圣文本特定解读佐证领土主权

不同宗教共享的宗教圣地因宗教利益重叠而导致在领土权、圣地使用权、监护权等权责范围存在治理困境，冲突频发，这给在当地有能源利益和地缘影响力绝对优势预期的美国以干预的切入点。美国社会普遍将中东视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地”，基于宗教起源地的神圣性叙事，形成了对中东地区的特殊宗教情感联结，这种认知强化了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天然介入责任”认知，例如对耶路撒冷地位的关注、对以色列作为“圣经应许之地”的特殊支持，纵容以色列把犹太身份与超主权领土绑定。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干预过程中，宗教功能介入的干预方式基本因循建构主义径路。而当把视野转向宗教作为实现世俗利益的手段，工具主义者并不特别关心作为信仰的宗教或者作为文化的宗教，其政治的重心是国家力量和物质利益。宗教是扩大

① Lee Marsden,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Polity, 2019, pp. 53–57.

② Melani McAlister, *Epic Encounters: Culture, Media, and U. S.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1945–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266–267.

③ Charlotte Morris, “To What Extent Has U. S. Foreign Policy Contributed to an Increase in Religious Inspired Terrorism Since 1945?” p. 191.

④ Bernard Lewis, *Faith and Power: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05.

⑤ 美国彼得·J. 卡赞斯坦、美国罗伯特·C. 基欧汉《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义》，朱世龙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2—262页。

⑥ 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 2003, pp. 142–144.

国家实力的工具，是决策层为达成地缘、资源、能源战略利益，自主地选择的工具，无关虔诚，也无关人神契约。宗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服务于国家利益最便捷的工具之一。无论是利用教派矛盾孤立战略对手，比如联合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对抗什叶派伊朗，保持地缘力量平衡，还是在战争时期将军事行动包装为“圣战”以动员民意，宗教都扮演了为美国地缘政治博弈披上道德外衣的角色。^① 在非战争时期，这种工具化则表现为用所谓“民主改造”和宗教自由等议题，为干涉他国内政提供借口。

（四）“神学、政治、财团、军工”复合体

美国的中东干预并非政府单方面行为，而是由宗教行动派、美国政客、犹太财团和军工团体组成的共同体，它以非正式松散联盟形态在背后推动的美国国家利益实现过程。这个共同体通过传播信仰、府院游说、资本控制、军工等方式，形成了一个可内部循环、产生复利的互助利益链。制造扩大化的宗教歧视和恐慌舆论、不公义的经济制裁、宗教自由议题国际化、以国内法进行长臂管辖、培植代理人打代理人战争等等，都是经验证明有效的手段。比如以“宗教自由遭到侵犯”为由，依据《国际宗教自由法案》（IRFA，1998）将伊朗等国列为“特别关注国”，施加经济制裁。^② 2010 至 2022 年间，美国 43 个州曾考虑立法禁止伊斯兰教法立法。^③ 再比如将伊斯兰教内部教派矛盾作为地缘政治工具，放大大宗教理解上的差异，联合一方打压另一方，加剧地区分裂，破坏地区可能出现的团结潮势。^④ 更有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多国冲突中煽动特定群体、培植代理人造成争端升级，放任冲突恶化，只为确保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绝对主导权、排他的霸权领导地位。新保守主义^⑤的美国外交政策不避讳宗教的价值功能性，宗教是美国地缘博弈的工具。

四、信仰者的回应和宗教后果

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宗教功能干预导致美国国内、中东地区都出现涉及宗教的矛盾升级，甚至陷入暴力冲突的反复循环，难以跳出安全困境。美国本身国内的宗教群体间信任，地区的宗教矛盾化解，全球的宗教压迫反抗，都被美国以神圣之名发动的干预蒙上阴影。

（一）宗教版本的美国内部社会身份撕裂加剧

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大部分明确支持美国政府对中东的强硬政策，支持以色列，对伊斯兰教持有比其他宗教人群更负面的看法。福音派基督徒的激进政治参与多被用于佐证美国宗教影响政治和宗教群体的政治参与。^⑥ 福音派更倾向于在外交上采取单边主义强硬立场。2026 年美伊冲突，

① Sari Hanafi, “The Imperial War Against Iran: The Trap of Religious Framing”, *The New Arab*, Mar. 12, 2026, <https://www.newarab.com/opinion/imperial-war-against-iran-trap-religious-framing>.

② Safi Ahsan Rizvi, “From Lawfare to War: How America Diminished It’s Coercive Power over Iran”, *Substack*, Mar 19, 2026, <https://safirizvi.substack.com/p/from-lawfare-to-war-how-america-diminished>.

③ Faisal Kutty, “How Four Decades of Sharia Panic Have Distorted U. S.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Report*, Dec. 18, 2025, https://www.wrmea.org/web-exclusives/how-four-decades-of-sharia-panic-have-distorted-u.s.-policy-in-the-middle-east.html?_cf_chl_rt_tk=SpfOxDjn01TdLXnPMRrIv4I9L4d2qIqgaLyeHR5peKM-1778082106-1.0.1.1-1rs2fQtEXuT_skrPm2zmDAte0Irtz9Cw4h3ypyl6TtM.

④ Mohamad Elmasry, “Amid Holy War on Iran, Will the West Examine the Roots of Christian and Jewish Rage?”, *Middle East Eye*, Mar 15, 2026,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amid-holy-war-iran-will-west-examine-roots-christian-jewish-rage?utm_source=hathalyoum.net&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news_redirect.

⑤ Abrar Saloxiddinovich Turaev, “Islamic Factor in Neoconservativ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SA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cience Journal Theoretical & Applied Science*, Vol. 70, Issue 2, 2019, p. 175.

⑥ Jody C. Baumgartner, Peter L. Francia and Jonathan S. Morris,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Public Opinion of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1, No. 2, 2008, p. 172.

“史诗狂怒”行动开始后不久，出现多名军方高层指挥官用“圣经预言”为战争辩护的言论，美国军事宗教自由基金会收到数量众多的投诉，^①指责军队指挥官劝导军人以生命实践某种宗教愿景的妄言。哪怕是体现普遍大爱的人道主义救援，美国国内也提出针对性的反思。美国对中东的人道主义救援会无意，有时很可能是有意，将人群分为值得救助的和可以忽略的。这种划分“恰好”契合既能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又符合基督教推崇的关爱同情心。客观地说，美国在主导对中东干预产生大规模破坏的同时，也在以人道主义救援打些微不足道的补丁。但是，这并没有达到破坏和救助之间的平衡。相反，矛盾行为暴露出的是“美国式的人道主义例外主义”^②。

（二）地区宗教矛盾被激化与异化

二战后，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曾联合当时的中东地区政权和穆斯林兄弟会，打击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冷战期间，主张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争取真正主权独立、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是美国标记出的敌人，因为敌视倡导团结的大阿拉伯主义、敌视重视独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敌视有左翼进步色彩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美国煽动军事政变、资助反对势力、使用制裁工具屡次干预阿拉伯世界。以瓦哈比主义为代表的极端保守的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兴起与美国的干预有直接关系。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入侵伊拉克，推翻逊尼派主导的萨达姆政权，侧面导致什叶派势力崛起和“伊斯兰国”组织的诞生，打破海湾地区原有教派平衡。后续美国学界政界推行“什叶派新月地带”叙事，刺激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强化教派动员，导致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国冲突全面教派化，沙特与伊朗的“新冷战”成为地区主要矛盾，教派矛盾从民间认知上升为国家对抗。教派矛盾因美国干预而被人为不断放大。^③美国刻意利用宗教夸大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矛盾，并推进其对立化。一方面将伊朗塑造为邪恶的“什叶派宗教扩张”代表，突出教派分歧以孤立伊朗；另一方面掩盖沙特等亲美政权的内部经济社会矛盾，将巴林、也门等国抗议归咎于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渗透，从而为支持亲美政权镇压民众、介入地区事务提供理由。中东变局后，美国支持沙特主导的逊尼派阵营，为也门、叙利亚的逊尼派反对派提供资金、培训，将教派矛盾转化为代理人战争的动员工具。为了维护美国自身的海湾军事基地与能源利益，美国可以在巴林问题上默许沙特出兵镇压什叶派抗议。^④美国的干预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中东宗教矛盾升级，形成恶性循环。有研究者认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打交道的失败，根源在于美国无法理解中东政治背景和动态，矮化中东的部落、派系、宗教现象。^⑤美国的政策决断常被对中东文化误导性的偏见所左右。在被干预的国家看来，这种“无法理解”和“偏见”是霸权国的傲慢和对非我族类文明的轻视。

（三）处境恶化催生极端主义威胁升级

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导致巴以冲突长期化，巴勒斯坦穆斯林、耶路撒冷圣地归属问题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宗教痛点；同时美国对沙特、以色列等盟友的宗教歧视政策，视而不见，进一步加剧宗教群体间的对立与撕裂。^⑥其后果是产生更严重的暴力恐怖主义，不限于某个宗教或教派，而是所有身处暴力冲突中的各方，都会产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美国反人道主义的暴力干

① “US Troops Told Iran War is ‘God’s Plan’ to Trigger Armageddon”, *The Express Tribune*, Mar. 4, 2026, <https://tribune.com.pk/story/2595807/us-troops-told-iran-war-is-gods-plan-to-trigger-armageddon>.

② Keith David Watenpugh, *Bread from Stone: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Humanitarianis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 91.

③ 章远 《中东政治发展危机的安全结构约束》，《西亚非洲》2019年第6期。

④ 刘中民 《试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以巴林问题为案例的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

⑤ Fawaz A. Gerges, *What Really Went Wrong: The West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 ix - x.

⑥ 比如美国视而不见以色列2018年通过《国籍法》对阿拉伯裔德鲁兹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歧视，进一步加剧巴以地区宗教群体间的对立与撕裂。

预，事实上变成逆向的宗教动员，把原本只是反感美国的力量推到反美，甚至不惜发动以宗教为名的战争的立场上去。美国的中东战争与占领政策，如虐囚、轰炸民用设施和空袭平民，激化中东的反美情绪。比如 2014 - 2017 年间，“伊斯兰国”组织正是利用美国制造的教派对立，以“保卫逊尼派”为口号扩张势力；而以暴制暴的美国反恐策略，没有培养有利于民生的发展环境，宗教少数群体处境恶化，贫困和愤懑催生和放大宗教极端主义，反而进一步侧面印证极端主义组织招募成员所使用的反美宗教叙事。^①

五、结论

宗教功能干预为理解中东领土冲突、大国竞争、区域秩序演变提供了另一个解释维度；宗教因素既可以是决策者规划战略的策略工具，也是各方政治力量进行动员和合法性辩解的话语资源。宗教不应被视为单一的、独立的冲突驱动因素存在。宗教内嵌在人类历史、国家、民族、社会、生活的长卷中，宗教的意象和功能永远被政治行动者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有策略地调用和重新诠释。宗教在美国的中东干预中既是被动响应国内政治压力的因素，更是主动塑造、服务于不同阶段战略目标的灵活工具，深刻影响了地区的冲突格局。原生主义层面的宗教叙事，以话语构建起军事干预行动合法性，又被工具化利用来为美国对外战略博弈服务。美国常将地缘政治目标包装为与宗教相关的正义叙事，为干预提供道义支撑。美国长期将伊斯兰文明建构塑造为西方的挑战者，“伊斯兰威胁论”更将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主义视为对西方安全、战略利益的威胁，“文明例外论”“伊斯兰威胁论”“文明冲突论”^②在美国始终有市场。小布什政府将反恐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理由推出“禁穆令”，均通过渲染“伊斯兰威胁”为军事干预、制裁中东国家、出兵中东提供舆论合法性。^③美国通过“国际宗教自由”等话语，将不符合其利益的政权贴上“宗教压迫”标签，实施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同时将伊朗、叙利亚等国定义为“支持恐怖主义”的“流氓国家”，把教派立场作为划分盟友与对手的重要标准，强化“亲美”“反美”的阵营对立。美国以推广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为名，推行“改造大中东计划”^④，将民主化和自由化改造中东政权包装为“文明进步”举措，实质是通过制度输出巩固霸权，却刻意忽视中东伊斯兰文化与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导致宗教与文化对立激化。八十余年间，美国对中东的干预中，宗教始终是被利用其功能构建干预行动合法性、动员盟友、压迫对手、护持霸权的关键工具之一，本质都是将宗教议题政治化、工具化，最终不仅未能解决中东冲突，反而让宗教矛盾成为地区动荡的长期根源。

最终，决定宗教因素扮演何种角色的，往往是政治权力、物质利益和社会结构的博弈，而非宗教教义本身。宗教很少是冲突的唯一或首要原因，更多是一种中介变量，能一定程度上控制外化行动的影响力性质和大小，但发挥根本作用的是嵌宗教入其中的国际秩序、力量结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交往关系、公平正义包容的现代化制度。因此，任何旨在缓解或解决群体冲突的政策与学术研究，都必须穿透“宗教冲突”的表层标签，深入剖析背后根深蒂固的政治诉求、经济不公与历史创伤，找到最和平有效的矛盾调解方法和道路。这正是宗教学与政治学交叉分析的核心价值所在。处境的困苦让不少生活受到战争破坏的民众更加希望回到宗教的庇佑里，地区

① 吴云贵 《解析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三种形态》，载《世界宗教文化》2018 年第 2 期。

② 刘中民 《从单边安全到共同安全——冷战后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进化》，载《外交评论》2025 年第 4 期。

③ Peter Mandaville, ed., *The Geopolitics of Religious Soft Power: How States Use Religion in Foreign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 126 - 127.

④ 姚匡乙 《对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 年第 5 期。

的宗教虔诚度反而增加，^① 其后果与美国以发动干预战争输出世俗化和自由主义的期待相悖。但客观地说，中东地区因为美国的干预而愈加宗教分裂、教派对立，这与美国通过离间分化中东团结，继而维护美国在中东利益，特别是保障能源利益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饱受战争蹂躏、承担外部军事干预痛苦的，是普通人民。美化战争的宗教外衣、煽动扩张的宗教野心无助于中东地区和平和发展，不可能为当地人民营造真正的乐土。

(责任编辑：袁朝晖)

① 根据战后应激情况的统计，2006 年黎以冲突后，民众（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低或战前自认没有信任的人群）祈祷行为显著增加。Ori Shai, “Does Armed Conflict Increase Individuals’ Religiosity as a Means for Coping with the Advers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War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296, 2022, DOI: 10.1016/j.socscimed.2022.114769.